

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几点思考

目录

张全景：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几点思考.....	2
一、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	2
二、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3
三、党的组织丧失了先进性.....	3
四、党风败坏 严重脱离群众.....	4
五、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	5
腐败分子为何不怕亡党亡国.....	5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	7
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	7
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	8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9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恶果.....	11
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蹈苏东覆辙？.....	12
《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再谈苏共亡党警示.....	15
读《苏共亡党十年祭》有感.....	17
对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的不同意见.....	19
苏共为何亡党亡国.....	20

张全景：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几点思考

原载：《学习与研究》 2008年第3期

（作者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本文是作者访俄报告的一部分）

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和辨析。我们访俄后对苏共失败的原因概括了四句话：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在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主要出在苏共党内。

一、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一再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和苏共的光荣历史。赫鲁晓夫最为典型，1939年3月，他在苏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2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把斯大林恭维了32次。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同样大肆吹捧斯大林。1954年他还下令刊登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歌功颂德的社论。他经常肉麻地说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母”。但到苏共二十大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把一切最丑恶、最肮脏的语言加在斯大林头上。同时诬蔑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前“丧失警惕”，战争爆发后“惊惶失措”，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这是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谎言。苏共二十二大后，赫鲁晓夫又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进一步造成党内和群众的思想混乱，并且为帝国主义攻击苏共提供了炮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走得更远，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党的领导，终于导致了苏共党亡政息。

怎样评价斯大林和苏共的历史，仍然是总结苏共失败教训的一个焦点。尽管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存在某些缺陷（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是难以避免的），但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1913年（一战前的俄国最高年份）相比，社会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最突出的表现是打败了德、日法西斯。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邱吉尔曾指出：他从沙皇手里接过的是木犁，撒手人寰时留下的是原子弹。

有的说，“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不全面的。苏联垮台前夕，其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相当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其先进科学技术可与美国并驾齐驱，有的甚至领先于美国，即便是轻、重工业存在某些不协调现象，也不至于导致失败，更何况苏联解体是在斯大林去世38年之后发生的，怎么能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早已去世的人呢？

二、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列宁深刻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的典范。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却没有根据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技术革命兴起的新形势，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使党的理论停滞不前，甚至提出了“20年建成共产主义”这样盲目而不切实际的理论。勃列日涅夫虽有所修补，但基本上坚持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到戈尔巴乔夫则走向极端，他的“新思维”和“民主化”、“公开性”，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必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苏共失败的过程中，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甚嚣尘上，各种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以及小说、戏剧、电影等各种文艺团队，都加入了反苏大合唱的乐队。乐队的总导演就是戈尔巴乔夫。一时间，社会主义、斯大林、列宁被说得一无是处，资本主义成了人间天堂。对于拥护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力量，极力打压。结果就是党内思想严重混乱，人民失去共同理想。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不打自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面对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现状，他说：“我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

三、党的组织丧失了先进性

随着苏共领导层的蜕化变质，苏共基层组织也丧失了先进性，失去了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质量下降，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到垮台前夕，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已经是徒有其名。有的说苏共20万党员时取得二月革命的胜利，35万党员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55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而在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党的思想教育长期无人过问。党的组织生活涣散，丢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党员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迷失了前进方向，相当多的人入党不是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奋斗，而是为了自己在仕途上、物质上捞取好处，1993年重建俄共时，加入俄共的原苏共党员还不到10%。圣彼得堡原有苏共党员50万人，1993年加入俄共的只有2.1万人，该市的加里宁区原有苏共党员2万多人，而加入俄共的只有85人。原苏联解体时规定，两个小时内党员必须选择政治上站在哪一边，结果绝大多数站到叶利钦那一边去了。这就说明苏共经过35年的蜕变，党员的质量严重下降，理想信念动摇了、瓦解了。可见，单纯追求党员数量、忽视质量是多么可怕！列宁说过，那些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话多么中肯，多么深刻！

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列宁的建党原则之一。列宁时期及斯大林初期党内民主集中制执行得较好，斯大林后来也搞“一言堂”、“家长制”，长期不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搞个人崇拜。赫鲁晓夫靠反对“个人迷信”上台，但上台后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更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勃列日涅夫也是独断专行，就连向阿富汗出兵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是几个人推翻政治局不出兵的决定而出兵的。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公开性”，是抽掉了阶级性的民主和公开，其实质只能是对反苏反共的人实行民主、公开，对拥护苏共、维护苏联而反对他倒行逆施的人，则千方百计进行打击，就连宣布共产党解散这样天大的事情，也是由他个人做出的。这样的党必然会失去党员和群众的信任，必然会失去党内和群众的监督，怎么能不失败呢？

四、党风败坏 严重脱离群众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列宁时期，非常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严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参加劳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联共（布）党史中专门讲了安泰与大地母亲的故事，深刻阐述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坚决反对特殊，以身作则。他经常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群众。据记载，仅在1922年10月2日至12月16日，就亲自接待125人次。斯大林在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方面也是令人称赞的楷模。二战期间，他的儿子雅科夫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提出，以释放雅科夫交换被俘的德军将领保卢斯，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不会用一名将军去交换一名士兵”，结果雅科夫死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和平建设时期，他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一件短皮大衣竟然从十月革命一直穿到去世。他去世后清点其物品时，发现他仅有900卢布存款。斯大林的后期也存在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大搞“个人崇拜”，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党内滋生了特殊化倾向。赫鲁晓夫时期，党风进一步败坏，并且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赫鲁晓夫不讲原则，瞎指挥，讲大话、空话、套话，胡干蛮干，不仅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而且搞工业党、农业党，盲目开垦“处女地”扩种玉米，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害，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衣钵，党风进一步败坏，他本人热衷于追求表面荣誉和奖赏，在其执政期间竟然得到200多枚各种勋章，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为他抬各种勋章、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他还要与列宁并列，1977年的十月革命节游行中出现了与列宁像同样大小的勃列日涅夫画像。他有一次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而阿利耶夫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更加严重。干部职务越高，特权越多。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达100多处，在这里各种进口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供高级干部享用，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些高干的子女也仰仗亲属的权威，为非作歹，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改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大批干部腐败变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国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

五、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

自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甚至使一些干部受到不白之冤。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任人唯亲，亲朋故旧、同学老乡、部属亲信倍受重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乎成为普遍现象。敢于讲真话，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受到打击迫害。因此党内低级庸俗之风盛行，对领导人只说恭维话、客气话、官话、套话。党在选拔干部问题上的政治标准、德才原则，被任人唯亲所取代，培植亲信、拉帮结派成为合法。

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各种借口推行其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他上任不久就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新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8人，撤职2人。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党中央和政府部长，近100名州委书记。有的材料说，短短几年内，150个边疆区、州、直辖市委的书记被更换了92.5%。错误的干部路线造成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空前混乱，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干部对党的离心倾向。

俄共的许多同志认为，苏共没有解决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党的核心领导层出了问题，这是苏共失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都成长于苏共二十大之后，根本没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更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俄共有些同志说，他们的背叛行为终究有一天会受到正义的审判。还有的认为，苏联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孤军奋战，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仍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压制，西方敌对势力采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搞垮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用收买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手段，使之成为“第五纵队”，在剧变中充当“别动队”、“民主派”，以实现其阴谋诡计。

总之，苏共失败的教训，需要很好总结，以便成为我们的鉴戒，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腐败分子为何不怕亡党亡国

<http://hi.baidu.com/%B4%F3%BB%C6%B2%E8/blog/item/bcc4b819af4db64342a9ad45.html>

作者邵道生 2008-07-15 转自：谓我自然网

面对那些权高位重的腐败者，我们不仅要问，你们“修行”了那么多年，也都快成“正果”了，怎么还是那么贪，还要以身试法，最后像陈希同、胡长清之流的弄得个身败名裂，这值吗？难道你们就不怕亡党亡国吗？

然而事实证明，腐败分子越来越多，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腐败性质越来越恶劣，腐败手段越来越层出不穷，腐败引起的民愤自然也越来越激烈……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对腐败分子而

言，“亡党亡国”之类的警告算什么！只是“耳边风”，一点用处都没有。

为什么？因为腐败分子的心态变了，不仅变得不怕亡党，不怕亡国，不怕亡社会主义，而且还希望共产党早变、快变。任何警告，对他们来说都是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

“亡党亡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意味着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变成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政权。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名叫罗伊·梅德杰夫的学者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后写了以下这样的一段话：“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

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科学院这位学者的调查结果说明了什么？

它说明了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前苏联的解体、前苏共衰落的真正原因在哪儿？我想，主要还是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就在那个几十年的僵化体制下形成的，而且是腐败了的特权阶层身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的真正敌对势力是来自于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权阶层之中。正是这个腐败了的特权阶层的形成加速了这个吮噬纳粹 德x帝国的解体。

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这一警告，对一般党员、干部也许还是很“管用”的，但是对已经腐败了的特权阶层来说，却是一点作用都不起的。因为对腐败了的特权阶层来说，他们需要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惟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特权阶层的利益，才更能使他们“名正言顺”地侵吞社会的财富。前苏联解体的最大赢家是谁？不是俄罗斯人民，正是前苏联的那些权贵们，他们不仅从政权的解体中保持了特权阶层们的利益，而且还从体制转换的混乱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人民越来越穷，而特权阶层们却是越来越富。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在当今的中国，“腐败了的特权阶层”还只是在形成过程中，因此我们要趁这个敌对势力还没有足够形成“气候”之前，进行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斗争。

总之，腐败分子是绝不怕亡党亡国的，因为他们是被异化了的。所以，希望他们自己悔过自新、“立地成佛”是根本不可能的。怎么办？只有一个“斗”字，与他们坚决地斗、狠狠地斗，将陈希同、胡长清之流的腐败分子毫不手软地从共产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惟有这样“动真格”的，才不会亡党亡国。

回复：1、“我给老兄你释疑吧：腐败分子早已把子女亲属移民海外，贪污受贿侵吞的公款等也转移海外，所以不怕亡国；腐败分子本就不是真党员，所以不怕亡党。”

回复：2、“你说对了，而且亡党亡国后他们反而是最安全的。怕亡党亡国？!还是腐败分子吗？”

回复：3、“腐败分子都希望亡党亡国，这样他们的罪恶就可以没有人追究了。所以标题应该改为：腐败分子为何怕不亡党亡国？！”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

2001年08月18日 09:25 黄苇町

编者按：本文是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根据7月13日他在中央党校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

1991年8月24日，苏共被迫宣布解散。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但诚如作者所言：“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作者运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理论，从一个侧面，再次简要地回顾、审视了苏共覆亡的历史，证明了“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的真理。

认真汲取苏共丢失政权、宣布解散的沉痛教训，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阐释的理解，坚定对“三个代表”是我们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认识。

正文：

不久前，我们隆重、热烈地欢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可对于北方邻邦的共产党人来说，此时此刻，他们的感情却是复杂的。因为相隔不到两个月的8月24日，就是苏共亡党(宣布解散)10周年的祭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大执政党的历史命运如此天差地别，不能不让人感慨和深思。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44%的压倒多数选票，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

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谢尔盖不解地说，“看来……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现在却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

是这个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吗？不是，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

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寻找。

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

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

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

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

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并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恶果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

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1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

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蹈苏东覆辙？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也出现过党群关系的严重危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无尽无休的阶级斗争，使人和人的关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温暖，不仅大批好人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连。十年“文革”，造成百业凋零，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新婚夫妇被迫分居男女宿舍。人们也在发问：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然而在广播里、报纸上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被强奸的民意由不满走向愤怒，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爆发。正是这种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帮”的覆灭。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这种爆炸性冲突，没有像前苏联、前东欧国家那样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台，也没有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这同样既要从历史的大背景，也要从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去考察。

应该说，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等我国无数民主先驱者终生奋斗的目标，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人们向往的西方大国竟公然支持中国的封建军阀来扼杀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爱国者是在屡屡碰壁后才发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想走也走不通。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不能相比的。

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一起进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这还不包括大革命失败前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不包括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之久，规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仅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里，全国就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人民并没有被反革命的屠杀所吓倒，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是他们用身家性命掩护下来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将领的遗孤，是他们抚养成人的。党和人民用

鲜血凝成的感情是无法分离的

二、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战斗在前，牺牲在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37年抗战开始时，全国还有4万党员，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已10倍于此，真正是九死一生啊。全国解放前夕党员发展到了300万，但仅全国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等到五星红旗升起的一天。

三、解放后，人民的生活、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的干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什么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的勤务员。还有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尽管他们有缺点，但他们与旧社会的那些贪官污吏相比无疑让人耳目一新。而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也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一直保持了下来。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但人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党的看法。他们认为“四人帮”一伙不能代表党，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仍然是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家。人民也亲眼看到了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无私态度。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经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对党也没有任何怨艾，而是重新焕发活力，投身于新的工作机会。

五、最重要的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和坚持了一条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使人民群众不断从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进一步增进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信任。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前苏联东欧道路的基本答案。

“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层含义之一

因此，我们党的坚不可摧，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这一生命线的认识，是渗透在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中的。陈毅元帅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手莫伸》。他是功高德重的开国元勋，但诗中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他承认自己是凡人，凡人有的种种弱点自己也都有：“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他不否认权力、地位、美色、赞颂都有诱惑力，但他的结论也绝不含糊，那就是“若无人民岂能活？”“来自人民莫作恶”。这正是他不被十里洋场的金钱美女所迷惑，不被非常年代的权势邪恶所压倒的高风亮节的精神支柱

记得有位老一辈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忘记群众的，有人忘了也会想起来；但是，以后的人就难说了，他们忘记了群众，也不容易想起来。今天重温这段话，的确是语重心长的。

如今，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党员、干部队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运用，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以及他们的眼界和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样一支向“四化”迈进的党员干部队伍，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带领群众艰苦奋战，使近2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时期，从没有任何政党能如此造福于中国

人民，这是我们时代的主流，也是获得举世公认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长期的执政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能不警惕的因素。那就是“铁打江山五十年”，有些人没有了危机感、威胁感，也没有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感；“太平盛世二十年”，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先富阶层消费方式的刺激，使追求享乐、拜金主义的倾向在增长，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的情况也更突出。有的干部对党的传统本来就知之不多，胆子却很大，跑官要官的方法更歪门邪道，群众观念却越来越淡薄，甚至个别出身贫苦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忘了自己来自人民。如胡长清从小放牛、砍柴、种田；而成克杰¹⁴岁时还不会说汉语。作为从穷苦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到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最不应该忘记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嘱托和期望，但却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苏共的历史悲剧告诉我们，困难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做了一个十分精辟的总结：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今天，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我们党是信任和拥护的。但是，如果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众和领导者离心离德。发展下去，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同样存在。

如今，建国已经五十多年了，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多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而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对比的经历。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通过历史课本，来认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干部。要说对比，他们更会用自己身边那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言和行来进行对比，看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哪些是真做，哪些是做样子。同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前辈们相比，他们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和平等的诉求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接触的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我们党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看法。

同样，建党已经80年了，经历过革命战火考验的一代绝大多数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如果说，人们对过去的领导者还有一种“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观念上的认可，那么现在的领导者则已不可能再靠这些了。

那么人民凭什么继续信赖我们呢？

只能靠一点，就是实践证明，我们党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而且，这种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群众的衷心拥戴，也才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中国新世纪的伟大进军。

这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用最大的篇幅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深层含义所在。（转自《南方周末》）

《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再谈苏共亡党警示

2006-12-26 17:44:45 21CN论坛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当日18时32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徐徐下降；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升上克里姆林宫。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迄今15周年。

拥有1500万名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何以被迫解散？成立69周年的社会主义苏联，何以成为历史？假如苏联没有解体，国家现在将是怎样？——在苏联解体15周年之时，一些俄罗斯人在追问，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而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85周年诞辰，已经发展成为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党。中共与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最大的执政党，历史命运为什么如此天差地别？

就此问题，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黄苇町曾接受人民日报主管刊物《人民论坛》记者的采访。黄苇町先生授权本报再次发表该访谈内容。

问：与苏共相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断发展壮大，长期执政？

黄苇町：原因很多，但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条是苏共长期陷于思想僵化，而我们党能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另一条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是世界上任何政党都不能相比的。在这种斗争环境和历程中，练就了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正是我们党所独有的这种精神品质，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培育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这些革命的奇葩。

问：目前，部分党政干部的思想状态、精神状态方面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如理想信念缺失、脱离群众、不思进取等等，对这样一种现状您怎么看？

黄苇町：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我们无数的共产党员献出了生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是始终流在一起的。也正是这种患难相依筑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现在，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已57年了，应该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在不同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表现出了自己的精神风貌。但你所说的理想信念缺失、脱离群众等情况确实也在某些党政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反差。

问：您认为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黄苇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首先，党员干部的队伍成分与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员的成分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这些人都有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愿望，在精神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牺牲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和劳动人民的本色。现在的党政干部的眼界、科学文化素质是过去的人无法比拟的，这是好的一面。但弱点也很明显，不少人没有经历过艰苦的革命锻炼，属于从校门、家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缺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没有与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所以现在更要强调发扬这四种精神。

其次，从大的社会背景来看，我们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期都是思想和价值观非常混乱的时期。反映到党内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权力仍对资源控制过多的状况，使权钱交易的需要和可能同时出现。有些人为了收买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另一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便产生很大的心理不平衡，他们与企业的老板相比，与通过权钱交易得到好处的人相比，甚至与自己的待遇与贡献相比，都有很强的失落感，这种不平衡和失落感便成为他们索贿受贿的心理基础。

还有，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共产党人所处的环境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白色恐怖和夺取政权的年代，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天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因为，离开群众不要说无法工作，就是连自己的命也难保。而今天脱离群众不会马上有生命之忧了，有的人就开始高高在上而不顾群众疾苦，甚至自己筑起有形无形的墙和老百姓隔离开来，这些巨大的反差，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问：针对在有些干部身上出现的这种反差，我们是否需要时刻警醒苏共亡党的教训？

黄苇町：苏共所处的历史和时代条件与我们不同，不能简单类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他们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最后还是因误入歧途而遭致失败。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苏共的教训，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因此，与苏共后期很多党员干部对空洞的、脱离实际的说教感到厌烦、对经济的停滞感到不满、对前途感到迷茫不同，我们的大部分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有信心，对未来预期较好。这是与苏联当时的党政干部的精神状态一个大的差别。

二是领导干部任用权力的高度集中和领导职务终身制倾向，使苏联的领导干部队伍中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腐败现象非常突出。而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总体还是好的，因为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强调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作风长期坚持。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一届领导集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理念的提出，还有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上改革的不断深化，加大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干部任用的“四权”，都有助于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从实践层面看，一些大事件也检验着我们的党群关系，如2003年“非典”时期，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涌现了很多感人事迹。

三是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充满开创

性的、发展迅速的国家。原苏联到了80年代的后期，经济长期停滞，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致使一些群众从不满意发展到离心离德。我们党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也是吸取了苏共的历史教训。当然，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中也遇到了苏共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例如，一些干部对外部世界的不健康的東西缺乏免疫力，拜金主义和一些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袭，都使我们不得不更加重视党的优良传统教育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大力宣传以四大革命精神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精神的重要意义所在。

问：对党政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从来就不缺乏，为什么效果总是难如人愿？四大精神作为革命传统精神，如何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黄苇町：现在在有些宣传教育活动中，形式主义的东西还比较多。有的搞宣传、理论工作的干部对人的思想状态缺乏深入了解。中央号召我们理论宣传工作要做到“三贴近”，我们自己就要首先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对“四大精神”的宣传也要与时俱进。如讲坚定理想信念，要强调共产党人为每个阶段目标奋斗都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和理想而奋斗。而这些阶段目标的逐步实现，包括我们党这85年办的三件大事，便证明了我们的理想和信念是现实可行的，也说明了我们的奋斗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我们今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还有，保持艰苦奋斗精神也要注入时代内容，艰苦奋斗既包括工作和生活条件上要朴素节俭即减少投入；还包括要有努力奋斗、多做工作的精神状态即增加产出。特别在社会转型这种复杂形势下，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在思想上要艰苦，才能提高执政能力。

此外，强调保持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也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出发。我们提倡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但也不否定正当的个人利益和追求，鼓励干部提高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本领。这既是承担好党和人民委托职责的需要，也是实现和发展自身价值的需要。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培养党员干部的开拓精神、创新精神等，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精神的发扬光大。（来源：经济观察报）

读《苏共亡党十年祭》有感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之际
制造部：杨文钦

自苏联解体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为什么一个有着辉煌历史、执政时间长达74年之久的政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近来读了《苏共亡党十年祭（修订版）》（以下简称该书）这本书，我终于有了明晰的答案。该书以史为镜，着重从党群关系的角度来剖析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深刻阐述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生命线，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这一重大主题。现将我读该书时感受最深的几点写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被自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该书在开篇就提到：“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了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执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戈尔巴乔夫的投降主义；等等。但是，还有一个不能被

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的比较少,这就是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接下来,作者主要以两个例子来论证这个结论,一是公开走到共产党的对立面,并公开声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叶利钦,竟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上了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二是在亡党亡国的生死关头,领导者却未能得到人民,包括还在组织的共产党员的积极响应,在8.19事件中,被派去逮捕叶利钦的克格勃最精锐的反恐特别部队"阿尔法"小分队,除了组长一人外,全体成员都拒绝执行命令,使叶利钦成功逃脱并组织反击,派去攻打"白宫"的军队也按兵不动,甚至发生倒戈,许多坦克调转炮口,叶利钦还登上坦克,向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说……

在这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教训得到了印证,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在谈到苏东教训时会警告过全党:"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第二,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是党内的特权阶层,腐败分子,该书谈到:"被自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是苏共亡党的决定因素之一,但这毕竟是一种被动性因素,事变前几个月的全民公决,还有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西方一些民意调查机构在苏联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表明,多数群众没有改变保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的要求,因此,尽管广大人民对苏式社会主义并不满意,甚至对苏共垮台反应冷漠,但不是搞垮苏共和苏联的直接力量。"而那些特权阶层,腐败分子才是苏共和苏联的真正掘墓人"。该书进一步谈到:"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因此,尽管点燃剧变的导火索的是反共分子,但正中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权贵们的下怀,自然一呼百应,顺水推舟,纷纷重新站队,因为他们明白这样不仅可以继续当官,还能更快发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者说撇开某些个人的角色差别而从社会历史的大视角看,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程度;或者说,是社会制度的不断部分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

剧变后的事实印证了以上论述,很大一部分原苏联党政官员,在政权被推翻后,他们的境遇没有一落千丈,也没有性命之虞,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权贵或老板,他们仍然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面目变了。

由此不难看出,腐败,是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它一方面腐蚀着领导干部,使干部腐化变质;一方面使党离心离德,丧失人心,恶化干群关系,"反腐倡廉"是我们从苏联学到的深刻教训。

第三,我们会不会重蹈苏联覆辙,回顾历史,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处,甚至细究一下发现,两国的领袖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所犯的 error 也颇为相似,如两国都经历过反侵略战争,民族在危亡的边缘徘徊;两国在发展经济上也有过失误和挫折;也都有过疯狂的个人崇拜时期;苏联的"大清洗"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使广大领导干部和人民蒙冤受屈;也都有着严重的腐败现象,等等。前苏联的种种丑恶现象在我国也普遍存在,但是,两国的后任领导的作为却不同,赫鲁晓夫公开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作为斯大林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却讳言自己的错误和责任,而邓小平同志则勇于承担责任,说过去的错误他也有份,不能都推给毛泽东同志,所以他较彻底地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党的建设上更是一错再错,他深刻洞察到苏共的种种弊病,但他开出的药方却是错误的,他拙劣的表现,加速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而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有了科学的建党理论,这个理论指引着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有力地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的中国也存在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首当其冲的便是腐败,在该书的附录中有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叫"只有腐败才能使我们亡党亡国",有位香港人士评论说:"如果说有什么能毁掉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话,那就是腐败!";有位国内民主人士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谁能打倒共产党,谁也不能打倒共产党!只有共产党内部的腐败,才能不打自倒!"江泽民也在许多场合说过:"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业。”“如果我们党不严肃注意,不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对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的不同意见

作者：数学 http://www.1911.cn/o3/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719

看了著名经济学家黄苇町先生在中央党校的讲课,《苏共亡党十年祭》,认为他的对于苏共的灭亡和解体的原因仍然没有讲到要害上,正因为没有讲到要害上,所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也就有可能在美国的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垮台,中国也有可能解体。

而我的观点则是,任何社会灾难的发生,都是和人民中间的‘神学思维’的泛滥造成的。因此,避免社会灾难的基本技术,就是严防神学思维的泛滥,要广泛地教育人民学会理工科思维的方式,即研究“是怎样”和“怎么做”这两类基本问题。

因此,苏联的解体,和苏联人民中间的神学思维的广泛流传而造成的。黄苇町先生认为,苏联共产党不能够代表苏联人民的利益,因此苏联人民就将苏联共产党抛弃了。但就算这是真的,仍然是神学思维的灾难。

如果现在回去问问苏联人民,再将苏联整合起来,很有可能有许多人都是愿意的。在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恢复了用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国歌,就反映了俄罗斯的这种心态。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的演员还说:“自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人民的脸上就失去了笑容。”

那么,如果我们再回到苏联时期,苏联人民怎样的思维,才是正确的,理工科的思维呢?

如果我是当时的苏联人民,我会这样想,苏联共产党已经不代表工人阶级,苏联的政治上层,已经是特权阶层,这对我很不利。但是,苏联如果解体了,我就会很有利吗?我的吃,穿,住的条件都会得到改善吗?我的儿女不会因为要镇压分离主义势力而战死吗?如果我能够将两种情况进行比较,能够从同样糟的情况中找到稍好一点的情况,则我是理工科思维,否则,如果单凭一些莫名其妙的神学的原则,无论是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还是伊斯兰教的真主,还是被神化的马克思主义(请注意我还承认有没有神化的马克思主义,即科学马克思主义)导致的一些疯狂的行为,都将造成社会灾难。

也就是说,理工科思维在这里是经济人思维。即两种制度,哪一种更好,需要从自身的利益去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当两种制度都非常糟糕的时候,选择不太坏的那一种。当然,即使不太坏,仍然可能很坏,但是仍然不应当犯傻去选择更坏。

也就是说,即使某一个政治制度已经不代表人民利益,仍然不是推翻这个制度的理由,除非能够从理论上,从细节上,完全地证明,新的制度一定更好而不是更坏。如果证明不了,则推翻一个不好的,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制度,仍然可能换来一个更糟的,更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制度,甚至遭受到极大的社会灾难,包括象南斯拉夫那样的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比如说,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有一个海外民运向我号召,反对共产党制度,推翻共产党制度,我就不妨假设这个海外民运不听美国指挥,也没有过什么卖国行为,道德上可能也不太坏,甚至道德高尚,比如是一个神父什么的。那么我就要问他:“凭什么?”他当然可以喋喋不休地向我大谈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所谓“罪行”。但是,就算我上当受骗承认了这些“罪行”,我还是要进一步问,这就是我需要反共的理由么?潜在地推翻共产党以后的政权有可能罪行更大,社会灾难也更大,如果那样,我何必反共?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年均增长百分之七以上,我的生活也还是每年都在好转,你民运如果上台,能够承诺有多高的经济增长率?计算的根据是什么?这些计算的根据,经济的政策,凭什么就不能够向中国共产党建议,由它们来实行?

如果他对我的理工科思维方式不满意,大骂我是狗奴才啊,专制的走狗啊,一个人对自己的神圣权利必须誓死捍卫啊,那就已经进入到了神学的思维,而我已经说过,再说一遍,这些年来人类社会的所有的大的人为的灾难,全部都由神学的思维所引起。国际恐怖主义的思维是这样,美国霸权主义的思维也是这样,还有各种宗教的思维,都是这样。

神学的思维有一个特点,就是看不清人民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没有经过非常严格仔细地计算,而是凭着一些高尚的口号,一些莫名其妙的信念,就做出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世界上凡

是神学思维泛滥的地区，那里的许多人民都不是经济人，不会计算自己的利益，反而会为损害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最极端的情况，就是邪教，能够使人残害自己的生命，残害得毫无道理可言，或者说只有神学的道理，如所谓“上一个层次”之类的东西。

比如说香港的这次七一大游行，游行的人民心中所想，我的看法，就属于神学的思维，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仔细地计算过，简单的逻辑分析都不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就是属于神学的思维，是由帝国主义和相应的宗教灌输给他们的。既然已经知道中国共产党接管了香港，驻港部队也占领了香港，如果真的中国共产党邪恶，你们这些人怎么可能有机会呢？不说别的，每天送进香港的淡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提供的啊。而我以为，实际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向中国发动的和平演变攻势，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和上层的某些领导干部，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神学思维的状态。包括这个在中央党校讲课的黄苇町先生。

我以为这是很危险的，发展下去，中国当然也有可能会莫名其妙地抽风，搞一些完全不利于自己的动作。

苏共为何亡党亡国

2008年01月16日 08:51 《炎黄春秋》【大 中 小】 【打印】 相关标签：[苏联]

斯大林建党93年、执政74载、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8月25日宣告自动解散，身后留下最丰富的遗产是一大堆问号。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我研究，苏共的悲剧之源，不在于个别问题上的失误、失策，而在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失败，在于背离了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宪政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是主权在民、公民权利至上，从而与君主专制的主权在君、君权至上相区别。宪政民主的具体内容虽多，其核心内容就是两项：一是民主选举，二是分权制衡。宪政民主发端于十七世纪，成熟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宪政潮流。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的政治体制建设，是顺此潮流还是逆此潮流？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新生的红色政权选择了反潮流的道路。于是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苏联国家亿万公民的命运，祸福安危，就此埋下了伏笔。苏共反宪政潮流，略举四例：

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在1917年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曾占居多数；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委会中，虽然布尔什维克占多数，但也还是多党制，其他党派都合法地存在和活动。在作为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7位担任了部长级官员。从1921年起，苏维埃中的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政党均被取缔。次年，俄共(布)“十二大”决议，要求对各种反苏维埃党派和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进行镇压。其他政党就此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此后七十年再也没有来自外党的竞争压力与纠错鞭策了。

二、“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本是社会常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活的绝大部分岁月里都是如此。但是，1921年俄共(布)(以下简称“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治思想意见纲领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的存在。“禁止任何派别”，实际上有一派是不被禁止的，那就是党的一把手(譬如说，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三十多年的斯大林)自己这一派就不被禁止。不但不禁止，而且他还可以搞“一派专政”，“合法”地动用一切手段去镇压和消灭自己不能容忍的任何派别。列宁也许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滥用制度的缺陷。但是，党的机体中的癌细胞毕竟已在此时植入！尔后的岁月中，虽有健康细胞的生长，终究难免被癌细胞所吞噬。就在列宁辞世10年后，1934年党的“十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有270多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所得票数竟远远高于斯大林。于是，基洛夫自然而然被视为斯大林的竞争者和反对派。同年，基洛夫被暗杀，凶手也随即被暗杀；杀害凶手的凶手又被暗杀。接着，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干部统统被以暗杀基洛夫的罪名处决，后来又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消灭了。这还没有完，紧接着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肃反运动。而那次“十七大”的党代表究竟哪些人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谁也搞不清楚，于是绝大多数人都成了斯大

林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其中陆续有1108人被捕，多数死于狱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约占70%)被枪决。世世代代、党内无派，何止千奇百怪啊！

三、以党代法、滥杀无辜在没有宪政分权的制度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是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冤狱遍于域中便在所难免了。1934年，苏联各州都成立了“三人小组”，由他们，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决定了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就在基洛夫被暗杀后几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訴訟法典的决议》。它规定要从重从快判决，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这就叫做杀人没商量了。据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米高扬回忆录，苏共“二十大”以后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的六年半中，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毙，这还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有两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他们先前曾经是专政工具，尔后根据专政的需要，不由分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24名党中央委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过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斯大林时期所杀的共产党员人数，让沙皇俄国望尘莫及。岂只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它从一开始就是斯大林铲除异己的清党运动。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联共有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亡。苏共二十大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尔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仍在继续，党内外持不同政见者被关进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的消息时有所闻。苏共和苏维埃政权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给自己四面树敌，新仇旧恨、层出不穷，亡党亡国的祸种就这样有增无己。

四、内定选举、自挖墙脚民主选举的根本原则是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选举人的意志往往与领导者的意图不一致，怎么办？在宪政制度下，领导者必须尊重选民的选择，否则就是违宪违法违纪；而在斯大林那种集权制度下，领导者往往内定选举结果，然后用各种手段去要求保证实现领导意图。这后一种办法，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大好事。而对选民来说，内定选举就是假选举、真欺骗。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导致权力体系基础动摇。1918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发布《关于乡与村苏维埃改选程序的指示》，规定所有乡与村的苏维埃均应进行改选，由中央自上而下派出官员建立选举委员会。富农、商人和反革命分子被剥夺选举权，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由上而下征求意见，等额确定，再提交选民公开投票。这种变相指定的选举办法后来成为斯大林时期的一种不成文法。1936年苏联公布新宪法，表面上扩大了选举权，改进了选举法，似乎也搞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然而，上述不成文法依然起决定作用。各级苏维埃代表候选人都是由党组织内部决定，等额交给选民投票，虽说选民可以另选自己的意中人，其实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根本无法当选。内定选举就像是按剧本演戏，翻来覆去演了70多年，不断地消耗苏共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宪政制度下的民主选举好比肥沃的土壤，它能打断腐朽的链条，一茬一茬出新苗，使病树前头有可能出现万木春的机会。而斯大林那种内定选举则是由前任领导指定自己喜欢的接班人，老树培养病树，病树培养歪脖子树，到头来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使它失去了吐故纳新、制度变革、重振旗鼓的活力源泉。待到历史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民主选举的时刻终于来临，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首次举行总统直选。选民真正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了，他们把占总票数57.35%的4559万多张选票投给了叶利钦，使他一举以高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而4位俄共候选人则分别以16.85%、6.81%、3.74%、3.42%的得票率被俄罗斯选民淘汰。宪政民主，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是吗？

以上文章都是从网上收集，需要查看原文，请使用搜索引擎通过文章题名查找！

《CIMS 论文的天地》电子书库说明

本站电子书库免费向大家提供网上搜集到的电子书，本站没有版权，如果有个别电子书侵犯了您的权力，请来信联系站长（电子信箱在网站首页<http://www.cimspaper.com>），本站将尊重您的要求，停止有关电子书的下载。

本站电子书库链接：<http://book.cimspaper.com> 镜像：<http://www.cimspaper.com/book/index.htm>